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南京为例

陈叶,朱必祥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文章在回顾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对2000 - 2007年间的最低工资水平就业效应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造成就业总量的损失。国有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三大不同性质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性质不同,外资经济呈现负效应。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的最低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建筑业呈现正效应。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解释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南京市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9477(2010)04 - 0041 - 05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文献述评

最低工资制度一般是指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不得低于规定的最低水平,其实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干预。在国外,自该项制度实施以来在经济学理论上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争论的中心议题是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制对就业有负影响。但是,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学者基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异质性等假设,也能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一定就是“就业破坏”,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正面因素超过了其负面因素。我国2004年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后,反对者和支持者理论上莫衷一是。不同的理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国内学者更多地转向了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一类是以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有:①李晓芳(2006)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有正面影响^[1]。②张凌(2006)研究最低工资和青少年就业关系时分析了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发现二者的关系在低、中、高GDP地区分别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和无明显规律的不同情况^[2]。③罗小兰(2007)使用1994 - 2005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该阈值之前,最低工资的增加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而超过该阈值之后,最低工资的增加将会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负的作用^[3]。④石娟(2009)以就业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最低工资变量、最低工资一期滞后变量和控制变量(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控制劳动力需求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同时,采用15岁 - 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来控制供给冲击对就业的影响)为解释变量,用对数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最低工资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结论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我国总体就业水平有负影响,但影响力度很小;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各地区的就业影响不同,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东、西部地区当年的就业有负影响,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西部地区,而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中部地区的就业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4]。

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有:①韩兆洲、安宁宁(2007)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率数据,发现在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5]。②王梅(2008)基于深圳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前提,选取深圳1992 - 2006年的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因变量,选取最低工资水平、GDP、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失业率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就业有正的效应,由于深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量从业人员为外地流入的劳动力,在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条件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加大劳动力的转移,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导致就业量下降,深圳市的最低工资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6]。但是,③周培煌、朱飞(2009)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广东制造业的就业效应,研究结果是,最低工资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将导致广东制造业就业下降6.64个百分点,产生了较强的负就业效应^[7]。④罗小兰(2007)使用1993 - 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模型实证分析上海市最低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农民工的就业会产生正的影响^[8]。⑤傅端香、石美遐(2009)选取1994年至2008年的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北京市就业效应进行研究。为了进一步研究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和人均GDP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具有正作用。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就业将增加0.52%。据统计,在北京市只有7%的企业以最低工资作为工资支付标准,所以,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会对企业用工成本产生大的影响。相反,劳动力供给会有所增加,从而促进就业的增加^[9]。

综上所述,对于最低工资制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是结论不同,乃至相对立。实证分析结论的分歧,原因可能来自计量工具和模型的内生性、序列相关、无效的工具变量、样本数据缺陷以及数据遗漏等问题。但是,更为可能的因素在于劳动力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最低工资政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影响,要取决于某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10]。分地域、分行业、分就业群体的研究仍然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将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城市南京市为研究对象,检验最低工资水平总体的以及不同性质经济体和不同行业部门的就业效应。

二、南京市最低工资情况描述

本文以2000—2007年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定量分析,考察最低工资的变动如何影响不同经济体和行业的就业水平及影响程度。选取南京市作为研究个案,原因有二:一是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城市,劳动保护相对严格,对于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的监督机制相对健全;二是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南京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的枢纽城市,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这些外来人员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工资待遇低,对最低工资变动敏感,因此对南京地区相关行业的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是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南京地区的最低工资是每年调整一次,但各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及调整的幅度存在差异,可以划分为三类,南京市区执行一类标准,溧水县、高淳县、原六合县、原江浦县基本参照二类或三类标准。遵循研究惯例,本文取最低工资标准中的一类标准。可以发现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是逐年递增的。从2000年到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由390元/月,逐年上升,在2007年达到850元/月,但是调整的幅度并不平稳,除2003年和2007年调幅略微上扬外,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作为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社会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991.42元/月增加到2007年的2658.75元/月,这里的社会平均工资指的是城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工资额,上述单位的职工受到最低工资立法的保护。进一步看,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年增长率为34.3%,远远大于最低工资的增长率13.1%,但国际上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一般在40%—60%之间,可见,南京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是低于国际一般标准的。除2003年和2007年的比例有所上升外,其余各年份都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如图1所示)。这意味着,低收入与高收入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在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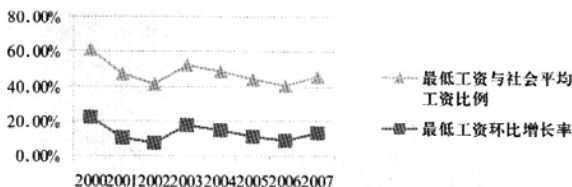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07年南京最低工资环比增长率及最低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例示意图

三、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结构和变量选择

一般来说,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就是指对就业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就业效应可以通过就业的绝对人数来衡量,也可以用就业率、失业率、就业流出、就业转换概率等相对指标表示。在采集就业率、失业率等数据时,可能存在统计口径问题,不便于研究结果的比较,因此,绝大多数实证研究者采用了就业人数这一变量来测量就业效应的大小。本文也选取就业人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一个地区就业水平的变动,除了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外,当然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内,但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很小。为便于计量,又不使模型缺乏解释力,在解释变量上,除了最低工资水平外,本文参照其他学者实证分

析时的变量选择,选取如下三个变量:1.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当地经济发展规模的GDP指标是与就业水平有关联度的首选变量。在模型中,G是采用剔除了物价波动以后(以2000年为基准年)的南京市实际生产总值。2.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国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给予的一定现金资助。一般来说,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通常与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是同步的,但总是低于后者。原因在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设计必须要平衡救助标准和就业意愿,救助标准可视为低收入家庭的保留工资,如果制定过高会影响个人的劳动力供给意愿,从而影响就业规模。在模型中,用MS表示当年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最低工资类似,这里也取南京各区(县)最低生活保障数额的最高额来分析。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数额,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投资,而资本投入会产生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企业的用工决策,或是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以适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或是排挤一部分工人,即资本替代劳动。文中用I来表示考虑了价格变动以后(以2000年为基准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方法上,本文仍然构建形式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OLS估计。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表达式如下:

$$E_i = \beta_0 + \beta_1 MW_i + \beta_2 G_i + \beta_3 MS_i + \beta_4 I_i + \varepsilon_i \quad (3.1)$$

其中, E_i :单位从业人员(单位:万人); MW :最低工资数额(单位:元); G :全市生产总值(单位:亿元); MS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数额(单位:元); I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单位:亿元); ε :随机扰动项。各变量对就业的作用方向可以通过考察各个偏相关系数来具体确定。各变量数据汇总于表1。

表1 2000—2007年各变量数据汇总

年份	E	G	I	MS	MW
2000	266.77	1021.3	412.2	180	390
2001	266.66	1150.3	464.91	200	430
2002	270.27	1297.57	602.95	220	460
2003	280.68	1576.33	954.05	220	540
2004	306.74	2094.80	1201.88	240	620
2005	316.69	2411.11	1402.72	260	690
2006	339.11	2773.78	1613.55	280	750
2007	367.81	3283.73	1867.96	300	850

数据来源:除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数据来自南京市民政网,其余数据均来源于2000—2007年的《南京统计年鉴》

注:单位从业人员E指的是在各级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民办教师以及在各单位中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二) 数据处理过程

在估计多元回归方程时,本文在使用SPSS17.0软件中向后筛选策略对解释变量进行选择,剔除不显著的自变量,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问题,以优化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I)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MS)分别被剔除出模型。同时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即方程中自变量的系数就是相对于因变量的弹性值。修正以后的新模型(3.2),经OLS估计后,调整后的R²为0.993,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很好;最低工资(MW)和全社会生产总值(G)的回归系数皆显著(Sig < 0.05),均通过了回归系数的t检验,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ln E = 5.718 + 0.483 \ln MW + 0.587 \ln G \quad (3.2)$$

表2 向后筛选后的新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sig
C	5.718	2.356	2.427	0.060
lnMW	0.483	0.162	-2.990	0.030
lnG	0.587	0.114	5.153	0.004
R ²	0.995	调整的 R ²	0.993	

从回归结果中的变量系数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对全市就业水平有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0.483),即最低工资标准没提高10个百分点,南京市的总体就业水平将提高4.83个百分点。全市生产总值对就业也有着正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587),且影响的程度高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从表1城市最低保障数据的动态变化中不难发现,尽管每年数额有所增加,但绝对数额却远不及最低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即使城市低保水平在攀升,也不足以让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且低保水平的变动对于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决策无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就业效应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忽略。在回归结果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不显著的变量被删除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解释变量往往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模型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来。这两个变量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线性方程中,往往会引起多重共线问题,如直接进行OLS估计,会导致其它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在本研究中,通过向后筛选法,删除了引起多重共线变量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以上讨论的仅是最低工资标准对南京市整体的就业效应。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按地区实行不同的标准,需要考虑同一地区最低工资对不同性质单位和不同行业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影响。下文进一步探讨最低工资的不同经济体和不同行业的就业效应。在模型的选择上,仍然以式(3.1)为基础,回归方法也主要借助于向后筛选法。由于因变量更换为不同性质单位 and 不同行业的就业人数,在利用向后筛选法选择显著性变量后的回归方程中保留的自变量会不一致。

(三) 最低工资对不同性质经济体的就业效应

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产业结构的变动带来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变动。从图2中明显可以看出,南京市自2000年以来,除2007年略微上升外,在国有经济中从业人员呈下降趋势,2007比2000年降幅为72.95%。尽管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外资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及国有集体企业,但外资企业的就业队伍却不断壮大,就业人数稳步提高,环比平均增长17.55%。相比而言,私营经济中的就业市场波动缺乏规律性,2000年就业人数开始回升,2007年又出现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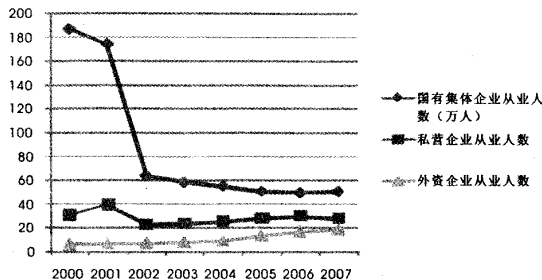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07年南京不同性质单位从业人员走势图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经向后筛选后的自变量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且由各偏相关系数的正值情况可以推断最低工资的变动在不同性质经济单位就业水平影响是有差异的。对于国有、集体和私营经济单位来说,最低工资的增加会增加在该经济部门中的就业量。而外资企业的情况与其不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抑制就业的增长,最低工资的回归系数为-0.396,表明最低工资每提升10个百分点,在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将下降3.96个百分点。

表3 不同性质经济体向后筛选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sig
国有集体经济单位				
C	-4.781	-4.781	-1.464	0.217
lnMW	9.271	9.271	7.737	0.002
lnMS	-6.197	-6.197	-5.837	0.004
lnI	-3.519	-3.519	-8.898	0.001
私营经济单位				
C	-14.134	3.677	-3.854	0.012
lnMW	3.196	0.874	3.657	0.015
lnI	-0.850	0.250	-3.404	0.027
外资经济单位				
C	13.680	4.279	3.197	0.033
lnG	4.207	.836	5.030	0.007
lnMW	-0.396	1.266	-3.131	0.035
lnI	-2.228	-2.228	-5.155	0.007

(四) 最低工资对不同行业的就业效应

行业的特点及所处的市场环境决定了不同行业门类用工需求的异质性,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劳动者的工资差异上。由此可以推断,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对不同行业部门的就业水平有着不同的就业效应。鉴于我国将行业划分较细,在作分析比较时不可能一一列举,本文仅仅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行业——餐饮业、建筑业、制造业进行比较,这些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受最低工资影响相对明显。图3中显示了这三个行业各年份就业数量的波动情况:从绝对数量上说,制造业容纳劳动力的能力领先于另两个行业部门,每年的就业人平均为建筑业人数的53.33倍和餐饮业人数的6.45倍。从相对数量上看,这三个行业的就业走势都呈现波浪状,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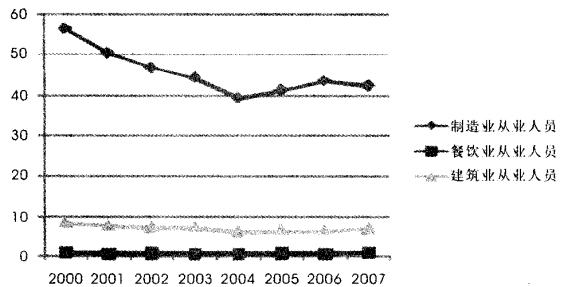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07年南京不同行业从业人员走势图

最低工资对这些不同的行业部门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就业效应,以及效应的大小如何,模型的回归结果做出了判定,如表4所示。采取向后筛选策略后余下的自变量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制造业的变量系数为-0.523,餐饮业的变量系数为-0.132,建筑业的变量系数为1.252。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减少制造业和餐饮业的就业水平,前者受到的影响大于后者。而建筑业行业较为特殊,最低工资的提高不但没有对该行业的就业带来负作用,反而最低工资每提高10个百分点会带来12.52个百分点就业数量的增加。

表4 不同行业向后筛选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sig
制造业				
C	1.476	3.214	2.899	0.063
lnMW	-0.523	0.103	5.072	0.015
lnI	0.535	0.069	7.737	0.002
餐饮业				
C	4.612	1.197	3.854	0.012
lnMW	-0.132	0.039	-3.404	0.027
lnG	0.550	0.273	2.012	0.010
建筑业				
C	2.769	0.544	5.087	0.015
lnMW	1.252	0.368	3.401	0.042
lnI	0.432	0.135	3.197	0.033

四、结论的解释与思考

(一) 最低工资对就业总量有正效应的解释

本文对南京地区最低工资与就业关系的分析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南京地区最低工资对整体就业水平的呈显著的正效应,具体到不同性质的经济单位和行业内部,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或正或负。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外资企业的就业效应是负的,而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就业效应是正的。这个结果与傅端香和石美遐对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正相反,他们的解释是“外资经济单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用人单位来说微不足道,并能增加对劳动力的吸引提高总就业量。而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经济单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的总用工成本的负担加重,从而会使用人单位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⁹¹。而我们对实证结果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在劳动合同的设计与调整上占有主导优势,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私营经济单位可以通过减少工人福利,减少在职培训机会、提高劳动强度等方式来补偿用工成本的上升,同时,部分劳动者基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会自觉地加入到就业队伍中,扩大了私营经济的生产规模和就业规模。至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由于企业劳动关系具有刚性,主要表现在不会轻易解除劳动关系、工资福利只能涨不能跌,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使其工资福利“水涨船高”,导致许多劳动者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而挤进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对于外资企业,尤其非高新技术企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其竞争的比较优势,有一些外资企业甚至将当地的最低工资作为员工工资指导价。当南京地区最低工资提高导致人工成本增加时,这类企业可能用资本来替代劳动,或者是资本直接流出南京地区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

(二) 最低工资对制造业、餐饮业和建筑业就业效应不同的解释

本文对南京地区最低工资与就业关系的分析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南京地区最低工资对制造业、餐饮业的就业有负效应,对建筑业的就业有正效应。这个结果也与傅端香和石美遐对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我们的理解是,城市化和现代化推进了大量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进程,2000-2007年间,南京地区从农村招收的从业人员每年平均增加17467人。大量的农民工由于学历低、技能缺乏、同质性高致使就业能力弱,仅能拥挤在制造业、餐饮业等对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的企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又使得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接近于最低工资。中式餐饮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2000-2007年南京市各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数量可以看出,每年从事制造行业人数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目前,南京制造业中重要产业的技术结构仍主要以中低

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人工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有较重比例。因此,最低工资的提高会缩小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制造业和餐饮业行业对最低工资的调整就会很敏感,最低工资的负就业效应在这些行业中发生也就是可能的了。回归系数表明,南京市最低工资每增加10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5.23个百分点,餐饮业则仅会减少1.32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受到抑制的程度明显强于餐饮业。这与制造业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较高的事实有关,正如上文所说,外资经济单位的就业与最低工资间是有着负向联系,这无疑强化了最低工资对制造行业就业的负效应。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建筑行业的就业。对此现象,笔者认为这与我国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无关系。其实,劳动力需求作为一种引致需求,企业是否增减雇员,关键在于其产品市场的需求。当企业产品市场需求萎缩时,即使最低工资很低,企业也会减员。相反,当产品市场需求旺盛时,只要最低工资企业在企业能承受的合理的范围内增长,在企业看来,成本的增加相对于市场利润的扩大来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应该说,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共处于相关联动的产业链上,这几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显然引致了市场对建筑行业的强劲需求,带动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最低工资适当的提高不足以构成对建筑行业中巨大利润的威胁,反而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该行业的就业。

(三) 最低工资与就业水平关系的政策含义

首先,劳动力需求是派生性需求,投资和经济增长是就业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力。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个供求力量严重失衡的市场,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不一定会造成全社会就业总量的大量损失,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提高会促进就业的增加。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时代到来时,当“民工荒”成为普遍现象时劳动者就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是顺应市场的必然选择。最低工资水平不一定能减少贫困或缩小收入差距,但合理的最低工资水平一定能保障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保证劳动力的长期有效供给。

其次,基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政府的最低工资管理也应当多样化。南京市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最低工资标准是依照地区差异来执行的。为了让最低工资的标准与促进就业有效衔接,不同性质的经济单位和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水平和调整都可以有所不同。

限于数据采集的约束,本文未能对其他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模型加以比较检验,本文的模型结构还比较简单,结论还需要在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检验,同时也需要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方法加以创新。

【参考文献】

- [1] 李晓芳. 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6.
- [2] 张凌. 中国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3] 罗小兰.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就业效应分析——对全国、地区及行业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07(11): 114-123.
- [4] 石娟.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基于全国和地区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09, 31(12): 8-11.
- [5] 韩兆洲, 安宁宁. 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J]. 暨南学报, 2007(1): 38-44.
- [6] 王海.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J]. 开放导报, 2008(2): 41-45.
- [7] 周培煌, 朱飞. 最低工资对广东制造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9(2): 69-73.

- [8] 罗小兰. 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J]. 财贸研究, 2007(4): 1-5.
 [9] 傅端香, 石美遐. 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分析——对北京市的实证分析[J]. 中国劳动, 2009(8): 19-21.

- [10] 姚先国, 王光新. 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4(1): 17-22.

[责任编辑:陶爱新]

Title: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employment ——Using Nanjing as the object

CHEN Ye, ZHU B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about th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 using the Nanjing City as the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 th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 during 2000 and 2007 by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improving of the minimum wage didn't cause the loss of the gross employment. Th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 are differential among the state-owner & collective economy,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foreign economy, the foreign economy takes on the negative effect. Th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 is also differential among the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ile the construction takes on positive effect.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paper not only explains the empirical study result, but also puts forward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nd thinking.

Key words: the minimum wage; employment effect; Nanjing city

(上接第24页)

‘正’字而无愧”^{[2] (p3202)}, 因此特谥“文正”。“太师”这一荣衔, 在嘉道以来的汉族官员中为仅有, 足见咸丰皇帝对杜受田的重视和怀念之情。同时咸丰皇帝还赏杜受田父, 前礼部侍郎杜堉, 人参十两, 食全俸; 杜受田长子杜翰, 时以翰林院检讨放湖北学政, 15个月就从从五品提升至二品侍郎, 并进而为军机大臣, 这么快的晋升除了其自身能力外, 也有一部分来自咸丰皇帝对其父亲浓厚的依恋; 次子杜(乔羽), 亦升为侍郎; 杜受田的三个孙子, 全都赏给举人, 准一体参加会试。

五、结语

杜受田为朝廷辛苦了一辈子并死在任上, 他是值得的, 给皇帝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给自己的未亡人留下了风光、荣耀, 给自己留下永垂青史的美名。杜受田的命运是顺利的, 他生在一个书香门第, 这让他青少年饱读诗书; 他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他的仕途敞开了扇大门; 他在外放学政期间被调回京城, 简为皇子师, 出色的表现让他与皇子建立深厚的感情且在官场平步青云; 他精准的政治眼光, 拥立奕訢为皇帝让他获得青年皇帝的信赖; 他的鞠躬尽瘁, 让他为自己争得崇高的荣誉, 为家人带来极大实惠。虽然杜受田肯定为成功付出了极大

的努力,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付出努力后都会成功, 他的生、试、事、逝都是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进行, 这些都成为他成功的因素, 实在令人玩味。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等. 清史稿·列传(第38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 王钟翰. 清史列传(第11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 钟叔河. 曾国藩家书[Z].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 [4] [台湾] 杨度. 国朝先正事略[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5.
- [5] 商衍鎤.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8.
- [6] 董丛林. 晚清政事探研[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7] 清实录第(40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8] 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 [9] 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6.
- [10] 茅海建. 苦命天子的一咸丰皇帝奕訢[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11] 杨英法, 杜献宁. “中外同心, 以灭贼为志”理解辨误[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2): 123-124.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lucky teacher of the bitter emperor ——Du Shoutian, teacher of Xianfeng emperor

LIU Yan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51, China)

Abstract: Du Shoutian, teacher of Xianfeng emperor, didn't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royal government and is not well-known by people, but he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Wen Zheng”, the highest posthumous among civi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after his death. It is no accident, in fact,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factors to achieve his status in the “birth”, “tests”, “events”, “death”, which shall be paid our attention to.

Key words: Du Shoutian; the emperor's teacher; “Wen zheng”